

#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马氏文通》

莫海斌

**内容提要** 在就读中国公学和留美期间,胡适曾经受到《马氏文通》和但丁等人历史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并由语言学研究转向关于中国文学问题的思考。这段经历内化为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语言学元素,帮助他打造出独到而雄辩的、操作性极强的白话文学革命方案,也造成了他理论上的偏颇和失误。明了这一点,当能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借鉴。

胡适曾不无得意地说:“我曾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的思想习惯,就做了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作上的成功之钥。……例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sup>①</sup>细查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进化的事实”,不难发现它们往往隶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即使是关于文学问题的讨论,其中也常常动用语言学的方法和判断。简约地说,在1911至1916年间,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sup>②</sup>的过程:1915年之前可以说是以文言研究为主的酝酿与准备期;之后,胡适一方面通过中外文学史的对比考察将中国文学问题定位在“文胜之弊”<sup>③</sup>上,另一方面则整合之前已有的文言词汇研究,继而拓展向文言与白话的比较性研究,将“文胜之弊”的解决落实为语言工具的革故鼎新,在领悟到“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之后,“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sup>④</sup>。语言学的素养和研究实践,不仅刷新了胡适文学思考的视野,使之有别于晚清以及历代的文学改革家,也内化为他文学理论的语言学元素,帮助他打造出独到而雄辩的、操作性极强的白话文学革命方案。

中国语文的现代化发轫于晚清危局当中,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以求国之富强的共同诉求中,开出了汉语拼音运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以《马

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为代表的汉语语法学研究等三大向度。或许是机遇使然,青年胡适于此三方面均有所涉及。他之断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sup>⑤</sup>,本身便是对拼音运动的一种回应;他在《竞业旬报》担任撰稿、编辑、主编工作,并在《国民白话日报》、《安徽白话报》等其他白话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一年多的写作白话文的训练成为他白话文学理论的最初的实践,也使他形成了“不为无关世道之文字”<sup>⑥</sup>的基本理念;但影响最大的还是与《文通》的相遇。

胡适说:“我想我在赴美留学之前,我一定已经受了一本研究〔汉文〕文法的权威著作的影响,那便是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sup>⑦</sup>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据《清史稿》记载:“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sup>⑧</sup>在多年游学欧陆的生涯中,马建忠对西方各国语文教育之普及深有体会,以为“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因此,他主要借鉴拉丁文法来研究文言,“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从而提炼出中国第一个汉语语法体系。《文通》成书出版于甲午战败后三年,主要是一部文言教学语法,希望以此来广开民智、经世致用:“夫如是,胥吾京兆亿兆之人民而群其材力,群其心思,以求夫实用,而后能自群,不为他人所群。则为此书者,正可谓识当时之务。”<sup>⑨</sup>在

这一点上,自谓“不为无关世道人心之文字”的胡适与《文通》是一致的。胡适后来也一直强调语法在中国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夫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今当提倡语法学,使普及国中;又当列‘文法’为必须之学科,自小学至于大学,皆当治之”<sup>⑩</sup>。

《文通》的另一基本特点是它自觉地“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对此胡适有过评说:“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sup>⑪</sup>在20世纪以至当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中国文法与外语文法作比较研究”<sup>⑫</sup>是汉语语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以上世纪最初20年间在语文教学上影响最大的三部语法书为例,除了《文通》和章士钊在《文通》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普及性的《中等国文典》(1907年),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年)在讲解英文语法时也常常佐证以古汉语例句。胡适回忆说他在中国公学时期(1906至1908年)的两位英文教员姚康侯和王云五也“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但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sup>⑬</sup>。在这种氛围下,胡适接触《文通》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从他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1911年5月)来看,他非常熟悉《文通》和《英文汉诂》的内容;赴美留学之初也曾专门托朋友从国内邮寄《文通》<sup>⑭</sup>,并一度起意要仿效《英文汉诂》撰写《德文汉诂》<sup>⑮</sup>。

赴美留学后,胡适曾经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德文,并通过多种途径吸收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胡适说:“我在十来岁的时候,便颇受《马氏文通》的影响。另一个影响我的人便是〔康奈尔大学的〕布尔(G. Lincoln Burr)教授。”<sup>⑯</sup>布尔是西方中古史及文艺复兴研究大家,1912年9月,胡适刚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即选修了布尔的中古史课程,自此史学兴趣渐浓,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语言的演变情况开始有持续的关注<sup>⑰</sup>。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院期间,胡适又先后选修了布尔的“历史的辅助科学”和乌德瑞(Frederick J. Woodbridge)的“历史哲学”。在这两门课上,他系统地接受了如何运用语言学、校勘学等方法处理史料、考辨真伪的西方史学训

练,而利用语言的时代性差异来清查伪托、认辨窜改,是这类训练的常规内容。在修读这两门课的过程中,胡适产生了“对时代变迁所影响的语言和文法上变化的研究兴趣”<sup>⑱</sup>,从而认识到《文通》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历史上的变化,把相隔一千五百余年的两个时代里不同的句子,混在一起比较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便被不经意的忽略了”<sup>⑲</sup>。

西方学界是在19世纪历史语言学勃然兴起后方才普遍意识到语言自身的历时性演变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相似,至于历史语言学的观念则滥觞于文艺复兴初期但丁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倡导以及有关它和拉丁语关系的论述。但丁这些散见于《飧宴》、《论俗语》中的文字不仅初步搭建起研究语言变化的理论框架,也激发了当时人们打破拉丁语垄断局面、研究本族与本国俗语、方言的热情。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里说:“我这几年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其中“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语的优美。……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但丁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工作为他们的中国同行提供了范式(paradigm)上的借鉴。例如,胡适著名的死活文字之论便可能是来自于但丁的“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而在16世纪中期,“‘死’语言的观念起源于当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当时有论者认为拉丁语是一种无法用口头表达的语言,它“只不过是纸和墨水而已”,譬如贝内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在《埃尔科拉诺》(1570年)里就“将语言分为三类:‘活跃的’语言、‘半活跃的’语言和‘死亡的’语言”<sup>⑳</sup>,和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胡适所接受的语言学影响主要来自于《文通》和发轫于但丁的历史语言学以及欧

洲现代语言发生史,他的汉语研究也因此以《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915年8月26日)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的文言研究和后期的白话以及文白对比研究。例如《诗三百篇言字解》(1911年)径直以《文通》为理论依据,以至于后来郭绍虞讥评它“实在是利用了王引之的方法去附会马建忠的理论”<sup>④</sup>。《论句读及文字符号》(1915年8月2日)也注明“本文所用名词及界说,多本于《马氏文通》,而间以己意改易焉”。《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首次提出文言“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与但丁等人的说法极为相似。在此之后,胡适开始从中国文字问题的争论转向中国文学问题,他的语言学研究也发生分化:《尔汝篇》、《吾我篇》是对文言词汇用法的历时性考证,并以此来批评《文通》在方法论上的错误;“的”字文法的研究是他白话语法研究的开始,这一类研究明显受到但丁等人的启发,并直接服务于他此时的文学革命思考。胡适以为,《文通》以降“皆文言之文法耳,而白话之文法,至今尚无人研究……今日之德文、英文、意文、法文,在当时皆所谓土语、俗话者也,一旦经但丁诸人,用以著文作诗,遂皆一跃而成文学的国语,而千余年通用之拉丁遂成废物,于此可见非有‘活国语’,绝无‘活文学’,亦决无有生气之国语也。然则白话之文法,岂非今日一大急务哉”<sup>⑤</sup>。上述两类研究也合并在了文白之对比中,成为胡适鼓吹白话文学的强有力的依据。他以为1916年7月6日日记“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一则“很确切地表达了我对策动中国文学革命的中心思想”<sup>⑥</sup>,其中核心的第五、六两条就是建立在文言与白话的词汇、语法比较上的。也就是说,在胡适处,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文学是他语言研究的旨趣所在,语言学则为文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不妨结合《文通》和历史语言学对胡适的影响,来进一步分析胡适文学革命理论中的语言学元素。

《文通》激发了胡适自觉而强烈的现代语法意识。他曾自评《诗三百篇言字解》“此为以新文法读吾国旧籍之起点”,并对这项工作期许甚高:

“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旧籍,审思明辨,则成一成文之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若不此之思,……而上下二千年之文明将沉沦以尽矣。”<sup>⑦</sup>基于这种考虑,胡适在谈诗论文时非常重视语法问题。早在1915年6月6日,他便从语法角度分析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认为“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顿挫抑扬!‘江南游子’,乃是韵句,而为下文之主格,读之毫不觉勉强之痕”;至于“吾国诗句之长短韵之变化不出数途。又每句必顿住,故甚不能达曲折之意,传宛转顿挫之神”,从而得出“词乃诗之进化”的结论<sup>⑧</sup>。相同的诗例和表述也见于1919年的《谈新诗》。在胡适看来,中国韵文由诗而词而曲而白话新诗的演变,遵循的是合乎日常言语之自然的进化趋势。所谓合乎日常言语之自然,其实就是符合日常语法的规定。一直到1931年的《评〈梦家诗集〉》,他仍然反复强调诗中的语法问题,并批评“《悔与回》不用标点,这是大错。留心这是开倒车”,和他《论句读与文字符号》中的观点并无二致:“无符号则文字之结构,与句中文法上的关系,皆无由见也。……今国人果不欲讲求文法,则亦已耳。苟其欲之,不可不先求所以表示文法之符号也。”

语法学的知识和研究更直接介入了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建构。回到胡适1916年7月6日札记“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这篇集中代表了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札记共九条,其中第五、六两条直接从语言学上立论,通过四个方面的文白对比来说明“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查其由来,则源于胡适对于白话中“的”字用法的研究以及《文通》关于文言倒装句法的描述。吕叔湘《重印〈马氏文通〉序》里说:“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都是《文通》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的。”<sup>⑨</sup>在此基础上,胡适发现白话中的“的”字“可代文言之者字、之字、所字,细析之,凡得八种用法”,其中承转代名词“所”字作宾语时往往前置,而在白话中用“的”字时

又恢复常态,例如“谁所作”和“谁做的”。胡适认为“在文字史上,此种文法变迁,乃一种大事,其重要性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兴亡”<sup>⑧</sup>。在“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里,上述结论被用来说明从文言向白话的进化的两种表现:“文法从繁到简”(“的”字取代了“所、者、之”)和“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例如“吾未之见”和“我没有看见他”,“己所不欲”和“自己不要的”)。至于“的”字“用为表词的形容词”和“用于状词之末”这两种用法,由于不见于文言,也在“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中被用来证明“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虽然胡适的文白对比在某些地方并不准确,例如白话中“的”字“用为表词的形容词”,其实是指代词“是”虚化为系词,但他所概括出来的词汇双音化以及上引各条还是相当敏锐而准确地勾勒出了文言和白话的基本差异<sup>⑨</sup>。一旦这种科学研究的结论与社会进化论相结合,自然会在文学革命的宣传和论战中产生巨大的威力。

新的概念、理论也意味着新的眼光与阐释。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导致中西语言研究传统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各自有所侧重。中国的古典学者大多着眼于古代文献,古汉语语法一直以先秦书面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古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语言学则侧重于日常言语的研究,即使是但丁倡导的意大利俗语也是古拉丁语在欧洲民间产生的变体之一,习惯上称之为“罗曼语”或“新拉丁语”。在《国语文法概论》里,胡适强调“中国语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要把西方语法作为“比较与参考”的对象。在极大程度上,他的汉语语法是一种西化的语法。因此,《文学改良刍议》里的“须讲求文法”指向的是以口语为主的语法,胡适所主张的“作诗如作文”也有着迥异于前人的新的内涵。作为胡适主要的论战对手,梅光迪曾致信胡适,批评“足下初以为作诗如作文,继以作文可用白话,作诗亦可用白话。足下之 syllogism〔诡辩〕即‘亚里斯多德’亦不能难。然弊端在足下之 Major premise〔大前提〕耳”<sup>⑩</sup>。梅光迪很清楚,胡适的“作诗如作文”并不是宋诗一路的“以文入诗”或“以文为诗”,而是完全拆除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分界,进而将之还原、降低到日常言语的层面。在文学语言向日常言语

的还原过程中,文学语言后发的文体特性纷纷剥落,语言最基本的交流功能凸显出来。在胡适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中国文学形式大于内容、形式束缚内容的弊端。一些研究者认为胡适混淆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语体差异,其实抹平这种差异恰恰是胡适自觉的要求。对于“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胡适是这样解释的:“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覲庄书来用此语,谓 Prose diction 也)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sup>⑪</sup>言之有物是内容上的要求,另两条讲的是内容的传达,一是在语法上要求言语达意的准确、完整和缜密,一是在词汇上保持语言和当下现实生活的直接性关系,而这两点显然不是古文言所能担当的,也不是宋诗派通过诉诸先秦文言(“以文入诗”)来松动业已板滞的诗歌语言系统所能补足的。只不过,还原之后要有新的出发,回到日常言语层面的诗歌语言仍需重建自己的规范。虽然胡适的《谈新诗》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思考,但毕竟不能让人满意;倒是他对“须讲文法”的坚持,竖起了早期白话诗中文法崇拜的偶像,成为后起一批新诗人理论批判的靶子。

历史语言学观念和但丁等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层面上,尤其是死活文字之论。首先,胡适用文字之死活来说明文言与白话的差异,自有其合理性,例如在《答梅觐庄——白话诗》里,胡适说“文字没有古今,而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sup>⑫</sup>。“欲”变为“要”,“到”取代“至”,都属于常用词的文白变迁。在汉语里,常用词的数量并不多,但它具有常用性和稳定性,是词汇系统里的核心部分,起着保证语言连续性和为创建新词提供基础的重要作用。所以说,“常用词的变化对整个词汇系统而言就是一种带根本性的深层次变化;就整个语言系统而言,常用词的变化也就意味着语言的某种本质上的改变”<sup>⑬</sup>。

其次,但丁等人称拉丁文是已死之文字,倚傍的是古希腊罗马开创的以日常言语为对象的语言学研究传统,即德里达在哲学层面试图颠覆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亚里斯多德《解释篇》就曾

明确指出：“言语是思想、经历的表达，文字是言语的表达。种族不同，言语则不同，文字也不同。”针对于此，高友工根据对待语言和文字的不同态度，把语言学分为两种：以语言的交流功能为主的语言学和从记录功能发展来的文字中心的语言学。在前者中，文字表现语言，为语言服务；后者却是言语反过来模仿文字，文字独立记录思想、情感、经验，并不依傍具体的言语情境，所以其自身的意义更为深刻丰富，组织也严密齐整<sup>⑧</sup>。索绪尔在比较拼音文字和汉字的差异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思。胡适贬文言为已死之文字，所采用的即是以语言交流为主的西方语言学的标准，希望以此来为白话文学开路。1916年，胡适表示“凡言语要以达意为主”，要“颂之村姬妇孺而皆懂”<sup>⑨</sup>；在《白话文学史》里，他认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言文开始分离，文言文字不再能直接记录当时口语，“这可见古文在那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这也是“古文学的死耗初次发觉的时期”。黎锦熙更是将胡适的这一思路发挥到了极致，他以为存在于竹简龟甲丝帛上的汉字书面语由于受到书写工具的限制，从来不能真实地表现口头之言语，所以“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sup>⑩</sup>。在新文化运动中，死活文字之论的意义早已溢出语言学或文学的范畴，而成为横的移植以及与传统决裂的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虽然它本身并不符合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

其实，即便是胡适自己，也依然不能完全跳出传统的制约。死活文字之论采纳的虽然是西方语言学的标准，但具体阐发仍然摇摆于中西两大传统之间。郭绍虞批评胡适说：“由于他不了解个别意义和配置意义的区别，所以名为用新文法读吾国旧籍，其实还是用的推求个别意义的方法，并不是从语句组织上研究它的配置意义。”<sup>⑪</sup>在这一点上，胡适与《文通》是一致的。陈望道表示：“我们认为马氏所谓字义似乎含有三种不同的意义，《马氏文通》却将三种不同的意义混而为一，未加区别。”这三种字词意义包括个别意义、配置意义和会同意义。个别意义可以说是字词的辞书意义，属于字词“个体含有的意义”，是训诂学的研究对象；配置意义和会同意义属于某类字词

“集体组成的意义”，是“文法学或语法学研究的对象，如果单就意义这一方面来说，正是集体组成的意义”<sup>⑫</sup>。在此基础上，李娟进一步指出：“马氏之所以混淆三种意义，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他的语法研究的立足点是不确定的、矛盾的。所谓‘个别意义’是立足于字本身，而‘配置意义’则是立足于句法结构。”<sup>⑬</sup>简约地说，传统的中国语文学以字为基本单位，与字的形、音、义相对应的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大分支。西方语文学立足于句子，即便词法研究的也是语言单位潜在的词法功能。即词在句中组合时的形式变化及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强调的是词的语法意义，而不是训诂学的对于字的具体个别的词汇意义的考证。《文通》采用了西方语言学从语法上把握语言的视角和研究模式，也沿袭着中国语言研究以字为基点、积字成文的传统，因而带来理论内部的矛盾和混乱。郭绍虞以为胡适是用训诂学王引之等人的方法来附会马建忠的语法理论，正是看到了胡适同一类型的错误。例如，在最初认为文言是“半死之文字”时，胡适的根据是“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文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sup>⑭</sup>。这便是仅仅着眼于字词的个别意义，而忽略了它在句子里的搭配和功用。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早有辩证：“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因此死活也难分。……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如‘月’字从甲骨文时代就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文的缘故，现在，这句话中的几个字，还都时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的本身并没有明瞭的界限。”<sup>⑮</sup>所以，死活文字之论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它以西方语言学通则和语法理论为标准，在当时西潮汹涌的语境下，很容易使人信服；至于具体的阐发、举例，又暗合国人的固有思路，结果是将错就错，成为胡适文学革命理论陷阵冲锋的一把利器。

通过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

革命理论不仅受到了语言学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语言学的方式提出和展开的。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为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提供了确凿的学理依据,也因为中西语言学的差异以及汉语语法学草创期的历史局限,造成了胡适理论的偏颇和失误。明了这一层渊源,当有助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 ①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第1册,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②④胡适:《逼上梁山》,《胡适文集》第1册,第143页、第146—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③⑤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196页、第140页、第143页、第78页、第196页、第270到271页、第254页、第140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
- ⑥胡适:《真如岛》,《胡适文集》第9册,第4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⑦⑪⑫⑬⑭⑮⑯⑰⑱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292—293页、第292页、第297页、第294—295页、第293—294页、第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⑧《清史稿·马建忠传》,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第420页,中华书局,1987年。
- ⑨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马氏文通》,第13—14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 ⑩胡适:《国语法概论》,《胡适文集》第2册,第3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⑪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1册,第93—9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911年6月12日札记、1911年8月28日札记、1915年8月27日札记“瘦琴女士”条。
- ⑳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㉑郭绍虞:《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第125页,中华书局,1987年。
- ㉒胡适:《藏晖室杂记》,《胡适文集》第9册,第737页,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根据《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5月25日记录,此文应写作于较此稍早的时间。
- ㉓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集》第2册,第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㉔吕叔湘:《重印〈马氏文通〉序》,《马氏文通》,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在该序里,吕叔湘还指出“又如吾、我、予、余用法的异同,尔、汝、若、而用法的异同,作者都尽可能加以分辨。有时连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也不放过”。胡适《吾我篇》、《尔汝篇》便建立在此基础上。
- ㉕胡适:《藏晖室杂记·的字之文法》,《胡适文集》第9册,第733—7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㉖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文白的区别主要在于文言中疑问句和否定句里的代词宾语往往前置,指示代词‘是’由于其处于句子主题及对主体的表述和说明之间而渐虚化为系词等。”第287—2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㉗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卷,第146页,黄山书社,1995年。
- ㉘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第2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㉙参见龚鹏程《文化符号学》,第340—3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㉚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见胡适《国语文学史》,《胡适文集》第8册,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㉛郭绍虞:《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第125页,中华书局,1987年。
- ㉜陈望道:《漫谈〈马氏文通〉》,《陈望道语文论集》,第575—57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
- ㉝李娟:《〈马氏文通〉与中西语言学研究传统的关系》,姚小平主编《〈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第47—63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 ㉞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59—6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责任编辑:范智红